

菏泽护城大堤今昔



堤口凉亭和黄巢起义浮雕

菏泽古为乘氏，后称曹州。地处中原，膏壤百里，物阜民殷。黄河西来，浩浩荡荡，通天地之脉。河湖港湾，星罗棋布，滔滔勃勃生机。古城以此应运而生。据《曹州府志》记载，明正德十一年（1446年），巡抚张骥、学博徐思学、知州范希正，创曹州于乘氏地，“度形势，筑城池，划方隅，定民居”，城池格局奠定。又历经几届州相相继修缮，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，始告工竣落成。

黄河之水有利有弊，对菏泽民生影响巨大。据《菏泽地区志》记载：“从春秋战国时代，至民国时期两千多年间，黄河下游改道约26次，波及菏泽境内的达12次之多。黄河决口1500余次，发生在菏泽区域的高达161次。”据《曹州府志》记载，明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知州沈韩为了保护古城不受洪水侵袭，在离城周围五里处，护城筑堤。堤呈圆，城为方，象征天地。城外有池，池外有堤，“外圆内方”的格局始定。

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黄河决口黄陵岗（今河南兰考东北35公里处的宋庄村）。水入赵王河，东南城堤被洪水冲毁。时知州沈韩率众奋战五昼夜，复筑城堤，御水城外。后东南堤缺角（今程堤口处），为

此决口所致。明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知州周鼎重新修筑州城及护城堤。明嘉靖四十八年（1569年），浚济分巡道许鼎臣又加固护城堤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大雨连年，知州许恩率众于堤上植树万余棵，以固堤防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黄河决口于铜瓦厢（今河南兰考西北12公里处的东头头村）。大水破西堤而入，又破北堤而出。自此曹州连续水患达二十年之久。清光绪年间的《菏泽县乡土志》中，护城堤的八个堤口均有记载，现傅家堤口、接官厅堤口尚有，其他六处皆不存在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还曾有十个堤口留名。

菏泽护城大堤至今，已逾400余年，沧桑巨变，但其格局如初，只是堤势发生了较大变化。据《菏泽地区志》所载，由于黄河在菏泽多次改道，城堤防多次修筑，将洪水、沙灾拒之城外，导致堤外常年的泥沙淤积，其地面高于城内达3米之多。形成了“城之内地下于城外，城外之地又下于堤外”的断面，即“城市小盆地”的特殊地形。近百年来，寒暑更迭，黄河已治理，水患已遁，护城大堤防水功能渐失，遂延为百姓的游乐之处。

1948年菏泽解放，护城堤上部分地段有居民植树。1964年，地区政府发动群众，开展义务劳动，对城堤进行平整，开始植树造林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无人管理，大堤多处被乱挖乱占，树木盗伐，破坏严重。1978年，护城大堤分于四城区管理，政府疏于监护，土方盗挖，野草丛生。1996年，菏泽市政府（县级）将大堤管理权收回，成立园林处统一管理。2000年以后，然囿于大堤年久失修，加之挖土填塘，乱搭乱建，筑坟立碑，多处堤段日渐蚕食。

2017年，菏泽市委、市政府审时度势，关心民生，顺应民意，启动《环境公园修建详细规划》编制，拟对环城大堤实施保护改造。

该园于2018年顺利开工。公园建设范围为：从大堤中心线向内50米，向外100米，总面积241公顷，全长14.6公里。总体规划为：依托古堤，贯通水系，构成“一环四段、十景五湖”的景观。一环：城市公园环（绿色生态环、健康生活环、城市文脉环）。四段：四个堤段（南堤、东堤、北堤、西堤）。十景：十个公园（湿地公园、筑堤纪念馆、百花公园、民间艺术园、名人园、官厅公园、拓展公园、花谷公园、点将公园、乐活养生园）。五湖：五个人工湖（莲花湖、碧泽湖、锦绣湖、叠翠湖、金秋湖）。

工程建设已历经两年，公园基本雏形已现，部分景观已向公众开放。今骑行环堤一览，走南堤；西有湿地公园栈桥延伸，

莲花湖畔荷芦映天；东有筑堤纪念馆幽雅怀旧，劳作雕像活灵活现。过东堤；南有民间艺术园非遗荟萃，戏曲脸谱丑生旦，碧泽湖水波光涟漪；北有名人园史海钩沉，乡贤榜上摘英撷粹，状元墙上百世流传。经北堤；东有官厅公园亭桥凌空，锦绣湖岸竹秀柳烟；西有拓展公园，健身娱乐设施齐全，叠翠湖边枝茂叶繁。到西堤；北有花谷公园，盘石草堂楼榭升变，牡丹仙子散花托篮；南有点将公园将台金甲，黄巢跃马驰骋，叱咤风云剑指南天。

以上所观，真可谓一步一风景，一景一陶然。除此外，每个堤口皆有凉亭，已建28个，雕梁画栋，古色古香。堤上堤下还建有3条彩色健康步道，曲径悠长。节点广场达101处，青石铺洒，华灯饰。为保证环堤河水畅通，新建桥梁9座，顶涵涵6处，河道驳岸形式多样，溪间流水潺潺，玉带碧波荡漾。绿化景观以乡土树种为主，其中乔木71种，观果树20多种，地被植物110万平方米，水生植物约8万平方米。

环堤公园冠以生态为基底，以文化为媒体，打造出了菏泽城的新名片，成为曹州古城的新地标，优化了“外圆内方”的古城格局，再现了“花城水邑、碧水菏泽”的城市风貌。环堤公园为古城复兴增添了厚重一笔，又给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营造出“本地人留恋，外乡人向往”的活动空间，提高了菏泽市民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 邓文斌



望鲁集

望鲁集村位于曹县城东南25千米，安蔡楼镇政府驻地南7千米处。有东西、南北各四条主干街道，聚落呈方块状。全村2000余户，6000余人，其中回民接近半数。有李、张、魏、金、王等姓，逢农历二、五、八成集，为望鲁集东街、南街、西街、北街四个村委会驻地。

地处太行堤水库北侧，西临古（营集）南（南园）路、东靠黄白河的望鲁集村，古为望鲁阁。春秋时，该地属宋国。鲁庄公之女嫁宋公，常郁郁寡欢。宋公怕她抑郁成疾，就带她到宋国边境靠近鲁国境的地方去遥望故国，鲁国公主登上高楼犹嫌不能望远，竟流连忘返，宋公令民众为她筑一高台，高台上建阁，台得名望鲁台，阁得名望鲁阁。后因成集而名望鲁集，明设望鲁都。清乾隆年间，设曹州府黄河同知署，称曹州望鲁里，因距县城25公里，清末曹县县丞驻此，以驭东南方。

作为曾经的黄河古渡口，水路贸易中转站，曹县境沿黄河70公里内八大集之一的望鲁集，沿黄客商甚多，建有店舍、马棚，俗称“山西会馆”。有关帝庙、大寺奶奶庙、回民清真寺等古遗址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回民清真寺。《曹县志·古建筑·望鲁集北街清真寺》词条载：位于安蔡楼镇望鲁集北街行政村南北大路路东，始建于清代；该寺南北长45米，东西长60米，面积2700平方米；寺内有讲堂5间，坐北朝南，面阔20米，进深7米，砖木结构，重梁起架八砖铺顶，小灰瓦覆顶，门前两根木柱撑起前廊；水房5间，面阔18米，进深7米，重梁起架，八砖铺顶，砖木结构，带前廊，屋檐为木质结构，1991年重修；西边为清真殿3间，为1998年新建。

望鲁集最著名的土特产为白莲藕。《山东风物志》望鲁集白莲藕词条载：曹县望鲁集白莲藕有着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。传说春秋时期，鲁国公主嫁到宋国后，常思念故国，宋公便于鲁、宋接壤处筑高台一座。后来，公主回鲁国带来白莲藕苗植于筑台之坑内，从此望鲁集种植白莲藕就再也没有间断过。望鲁集白莲藕颜色白中略为透明，质地细腻且脆，落地能发出清脆声。其中，尤以生长于望鲁台坑边沿的白莲藕为上品，其颜色呈淡绿色，名曰“闷青”，生食甜脆园爽口。旧时，望鲁集白莲藕为珍稀之物，每当冬季，人们将新鲜莲藕用大红布条紧紧裹好，销往徐州、蚌埠、南京、上海、开封等地。

进入新世纪，尤其随着黄河故道的开发，望鲁集白莲藕的种植范围逐步扩大，年产量过百万公斤，成为山东省地方著名农业生态种植品牌。 丰 啸 鄞 鸿



菏泽环堤公园 邓文斌 摄



秦王避暑洞

海昏侯在巨野金山有座「烂尾墓」

金山，因“凿石得金而名”。位于巨野县“昌邑国”故城遗址东北15公里。作为金山古八景之一的金山崖墓，正是在位27天的汉废帝、海昏侯刘贺的废家。

从《汉书》的记载知晓，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、昌邑哀王刘髡之子。公元前88年，不到5岁的刘贺便继承王位成为第二任昌邑王。

公元前74年4月17日，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因病崩于长安未央宫。刘弗陵身后无嗣，谁来继承帝位？群臣讨论后认为，在武帝的六个儿子中，唯有皇四子广陵王刘胥还活着，帝位的继承非他莫属。大将军霍光则力排众议，认为早在武帝时便已将刘胥排除在帝位继承人之外。广陵王刘胥行事离谱，时常赤膊同狗熊、野猪等搏斗，与帝王的风范格格不入。这么一来二去，立嗣之议月余而不能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到5岁任昌邑王的刘贺便“捡漏”被锁定为皇位继承者。当年6月1日，18岁的刘贺于昭帝灵柩前继位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27天后，权臣霍光等人以刘贺在27天内犯下25条罪状为由将其“罢免”。

元康三年，汉宣帝把刘贺由昌邑王降封为海昏侯，刘贺由封地巨野昌邑改封到豫章郡海昏县（今南昌新建一带），并规定刘贺“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”，这就是说刘贺不仅不能回京朝觐天子，更不能拜祭宗庙，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列侯。

因为短期称帝，刘贺被废后赴南昌改任海昏侯，金山崖墓继而成为废家。

巨野县城东南23公里，便是金山。沿南面缓行，穿过茂密的松柏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秦王避暑洞”彩绘门楼。往北绕行不远，就到了人们俗称“金山大洞”的门前。门西侧，立有“巨野金山崖墓”石碑。

据碑文介绍，巨野金山崖墓俗称“金山大洞”。经考证，实为西汉后期昌邑王刘贺的废家。传说李世民曾在此避暑，故有“秦王避暑洞”之名。金山崖墓向正南，由明道、侧室、耳室及主室组成。崖墓开凿正室，鬼斧神工。正面和明道两侧石壁上，现存宋朝以来的刻石45块，其中年号清晰的27块。文字以题记、记事居多，亦有散文、歌赋。其内容多为秦始皇避暑传说、礼佛记事、金山四时风景、游览抒怀、乐水乐山等。石刻诗文的书法，虽无历代大家名迹，却大都出于朝野名士和地方名流之手。

据记载，崖墓总长89.80米，最宽处28米（含东西侧室），明道长63.3米，道壁最高处15米。东侧室长13.9米，宽3.2米，高2.6米。现存2尊高约90厘米，元泰定四年（1327年）所造的石佛像。雕刻精细，造型美观，西侧室长9.3米，宽3.1米，高2.6米。大洞正门上方，是金大定三年（1163年）金朝皇帝御赐落款的“敕刻大明禅院”。

禅院尽头是石凿的刘贺墓室。道长15.9米，宽2.4米，高1.85米。棺槨主室长10.6米，宽6.7米，高2.35米。在放刘贺遗体的地方，现在造了一个硕大的卧佛，金碧辉煌，历经金、元、明、清，香火经久不衰。

在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中，一件清晰刻有汉隶字体“南昌”二字的青铜豆型灯底座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这是目前关于“南昌”最早的实物资料。

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曾在学术研讨会上介绍，墓里出土了许多“昌邑九年”“昌邑十一年”字样的漆器，说明离开故乡的刘贺一直心系昌邑，渴望有一天重新做回昌邑王，因此很可能将从前过的山东称为“北昌邑”，将自己之后所处的江西鄱阳湖畔的都城称为“南昌邑”。“南昌”或许由此得来。

据菏泽籍化学家潘建荣介绍，刘贺被贬之地豫章今南昌的地名来历和沿革，始于汉高祖刘邦，高帝击败项羽，乃命御史大夫（后封颍阴侯）灌婴率骑平定江南。当时赵陀乘刘、项相争时，占领越南，即今两广及安南一部分地区。汉高帝恐他窥视中原，乃于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命灌婴建立豫章郡，翌年开始筑城据守。从此南昌就一直为江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唐乾元二年，废郡置“南昌军”，南昌之名始见于此。后又改置“南昌县”。南昌就是“建昌之南”！建昌县脱胎于海昏县（公元前201年—425年）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（104年）析海昏县置建昌。所以，南昌的名字由来与海昏侯刘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潘建荣还认为，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，大多铸刻有“昌邑国”铭文，还有书“昌邑九年”“昌邑十一年”文字的简书，都可证墓中文物属于原昌邑国运来之物。另外，墓中出土的皇家玉璽、仪仗器、仪仗杆等多为刘贺从昌邑国带来的。

刘贺从出生到离开，共在巨野昌邑城生活近30年。即便被贬千里之外的海昏国，昌邑一直是刘贺终生不会忘记的故乡。他也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，不过这一切都已成为奢望。 谢新华

墓志铭的由来

——从成武县博物馆许黄墓志铭、张寿墓碑谈起

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，唐·天宝九年（750年）的许黄墓志铭，方柱歇山顶式，四面环刻铭文，这种形制成为全国制式唯一的墓志铭。馆藏最早的是许项墓志铭，为唐中宗景龙二年（708年）；其次是王君墓志铭，为唐开元十年（722年）；第三是张茂墓志铭，为唐开元二十年（732年）。这四块墓志铭制式不一，体型皆不大，有就地取材之意。在宋代，董公墓志铭为宋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制式为长方形，体型较大。而到了明代，制式统一，全为正方形，并且越来越高档，越来越考究。

追溯墓志铭的来历，源于“一墓碑，一人名，一通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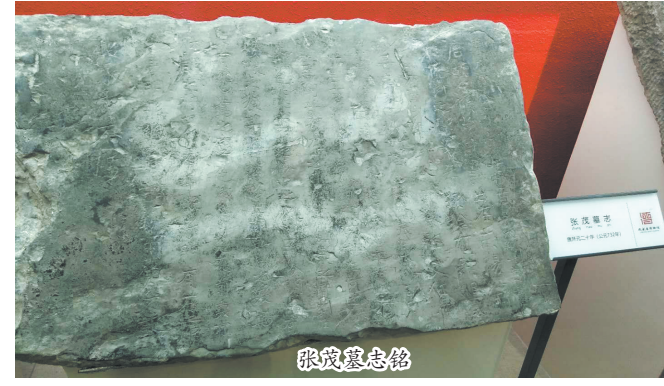
一墓碑，要从成武县博物馆另一馆藏珍品张寿墓碑谈起。张寿（89—168年），字仲吾，东汉成武人，任竹邑侯国相，逝后葬于文亭山北。张寿墓碑，又名张仲吾碑，是菏泽市发现最早的汉碑，东汉灵帝建宁元年（168年）立。宋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欧阳修见到此碑时尚完好无损，并为该碑作跋，称该碑为蔡邕所书，并收入其编写的《集古录》中。南宋金石学家洪适《隶释》录碑全文，碑凡五百四十二字。明代该碑仅存上段十六行，每行十四字。后被凿为碑跌，中间凿去四十字，又因自然剥蚀毁损三十多字，现可识读者一百五十四字。该碑隶

书，笔笔如铸，撇捺挑挑，雄迈静穆，变化多端。细微之间，横生妙趣，故显道古雄奇之姿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方朔、邓石如、朱彝尊、牛运震、翁方纲等均考证过此碑，并作评题跋。清隶书宗师邓石如三十岁得此碑帖，终生临摹，妙得其趣。公元1929年，上海扫叶山房《四体大字典》曾选用其中部分字做范字。1979年，山东省公布重要历史石刻，全市三块，成武占了两块，即张寿墓碑和孔子庙堂碑。由此可见，张寿墓碑的书法造诣之精深。

一人名，即撰写张寿墓碑文者蔡邕（133—192），河南杞县人。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，才女蔡文姬之父。蔡邕早年拒朝廷征召之命，后被征辟为司徒掾属，任河平长、郎中、议郎等职，曾参与续写《东观汉记》，领衔刻印熹平石经。后因罪被流放朔方，几经周折，避难江南十二年。董卓掌权时，强召蔡邕为祭酒。三日之内，历任侍御史、治书侍御史、尚书、侍中，左中郎将等职，封高阳侯，世称“蔡中郎”。董卓被诛杀后，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，不久便死于狱中，年六十。蔡邕除通经史、善辞赋之外，又精于书法，擅篆、隶书，尤以隶书造诣最深，有“蔡邕书骨气洞达，爽爽有神力”的评价。所创“飞白”书体，对后世影响甚大，被《书断》评为“妙有绝伦，动合神



许黄墓志铭



张茂墓志铭



许项墓志铭



面之文相接，起自正面首碑，终于背面末碑。每碑高175厘米，宽90厘米，厚12厘米。每字约2.5平方厘米，采用当时最通行的隶书字体，系蔡邕用红笔一字一字写在石碑上，石匠逐一雕刻而成。46块石碑立于洛阳太学之东，列成U形。“熹平石经”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正是有了轰动效应的熹平石经，东汉末年刻碑立石成为一种时尚风气。尤其为近去亲人立碑，成了时髦和必须。在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人人活命尚且艰难，为给亲人立碑，足以让中等人家倾家荡产。为此，曹操严禁立碑，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。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，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。

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“志”，即简述死者生平；后一部分是“铭”，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，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。以后也发展为仅有志没有铭的，但仍通称墓志铭。墓志铭又称“埋铭”“圻铭”“圻志”“葬志”等，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。北魏时期禁碑令废除后，此风仍不改，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。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，以唐代最为繁盛，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。宋元以后，墓志铭数量锐减。近代以来，西式葬法逐渐推行，碑墓合一之制日益盛，墓志铭之作渐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实行丧葬改革，丧事从简，并推行火葬，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，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隋启良